

东南亚华侨华人族群特征变化对华文传播的影响

鲁 芳

摘要:族群的群体特征会影响族群的语言选择,从而影响族群语言的保持和传播。东南亚华人华侨族群特征的变化影响着华文传播,其身份的二元性、民族自豪感和使命感、语言使用中的包容性对华文传播有着积极的影响。推进东南亚地区的华文传播,建议侨办继续举办有政策性倾斜的文化交流活动,避免传播意识形态领域的语言文化,通过华商群体构建华文传播的“星状”网络,发挥华侨华人在华文媒体传播中的重要作用。

关键词:东南亚华人华侨;族群特征;华文传播

中图分类号:D63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CN61-1487-(2019)01-0017-05

DOI:10.16721/j.cnki.cn61-1487/c.2019.01.004

“华侨”与“华人”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其判断依据是国籍。“华人”要满足两个条件,一是长期侨居海外,二是加入了所在国国籍;“华侨”通常指长久居住他国但又保留着中国国籍的人^①。目前全球近 200 多个国家和地区居住着近 6000 余万海外华侨华人,而东南亚则是华侨华人数量最多的地区^[1]。华侨华人约占东南亚总人口的 6%,东南亚华侨华人占全球华侨华人数量的 73.5%。华侨华人移居他国,必然带去包括语言在内的中华文化。

语言文化的传播受多种因素的影响,最主要的因素是人的身份认同。东南亚地区历史、文化、民族以及宗教的多样性决定了其文化生态的多样性,这就造成了东南亚地区华人族群身份认同的复杂性,也势必影响着华文在该地区的传播。东南亚华文教育从诞生之初就与华人族群的命运紧密相连。在落实“一带一路”倡议的背景下,通过华文传播提升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就应该发挥华人华侨在汉语国际传播和教育中的天然优势,这就需要深

基金项目:教育部国别和区域研究中心——西安思源学院东南亚研究中心(GQ17313)研究成果

为了提高中国研究专业的教学水平和质量,还必须处理好与当地教员的关系。如前所述,近年来国际学院招聘了多位从中国高校学成归来的泰国青年教师,他们已经成为中国研究专业师资队伍的主力军,多门有关中国的通识课程也都由他们来承担。这些年轻教员的特点是,年龄与学生较接近,彼此易于沟通和理解;他们是本土教师,在和学生的交流和沟通方面没有语言和文化障碍;他们有在中国长期学习和居住的经历,对中国情况也相当了解,因此在中国研究专业教学方面具有较大的优势。因此,作为外籍教师,应与本地教员加强联系、沟通和交流,及时了解和吸取他们的有益经验。例如,当笔者得知,有一位青年教师讲授的“中国历史”课程得到学生们的好评,即请他介绍教学情况和经验,虽然无法照搬,但从中得到不少启发。同时,有些本地青年教师也迫切希望提高自己的汉语和教学水平,只要他们前来求教,笔者也会尽可能全面地给其耐心讲解所提出的问题。总体而言,无论是本地还是中国籍教员,都有一个共同目标,那就是把国际学院的中国研究专业办好,培养出更多更好的懂汉语、知中国的人才,为推动两国关系的持续发

展做出贡献。

注 释:

- ①关于泰国法政大学比里·帕依荣国际学院“中国研究”专业的介绍,请查阅<http://www.pbic.tu.ac.th/chinese-studies-program/>。
- ②2017 年 3 月,笔者结合毕业班作文写作辅导课程的教学需要,组织和指导将于当年毕业的学生就“华人的认同问题”“为什么选学中国研究专业”及“泰国人看中国和中国人”等 3 个主题开展问卷调查,并对调研结果进行分析、研究和宣讲。参加调研的该届毕业生共 96 名,其中大多数为华裔,也有少数泰族及外籍学生。本文的论证主要基于这一问卷调查的结果,以及与历届学生的交流成果。

作者简介:杨保筠,西安思源学院东南亚研究中心特聘顾问、研究员,法国巴黎第七大学东方学博士,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泰国法政大学比里·帕依荣国际学院教授,研究领域为东南亚地区、亚欧关系、华人华侨等。

(责任编辑:朱希良)

入了解华人华侨族群特征的变化脉络及其对汉语传播的影响。

一、华侨华人的族群特征变迁与华文教育

华侨华人的族群变迁与华文教育是相辅相成、共生共荣的。

(一) 封闭的地域性族群特征促使华文方言自由发展 (19 世纪末期前的殖民时期)

从 17 世纪开始, 中国人就大规模地移居东南亚诸国。最初移居的中国人, 大多数是为了谋生而下南洋^[2]。这个时期的东南亚诸国除了泰国, 其余国家尚处于西方殖民者的管制之下, 移居而来的华人势必也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为了在当地取得一定的生存权, 华人不得不接受当地的殖民文化。西方殖民当局对华人的生活区域和生活权利都做出了一定的限制, 将他们置于“甲必丹”等特殊管制机制之下^[3]。当时的中国封建政权视移居他国的华人为“自弃王权的化外之民”, 对他们采取置之不理的态度和放任自流的管理方式。因此, 华人华侨对自己的族群缺乏一致性的“国”的认识, 他们为了立足和发展, 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以血缘为纽带的宗亲组织。他们守望相助, 又对故国怀有眷恋之情, 便通过华文传播寄托对自身民族身份的认同, 因此出现了华文学堂, 教材主要是《三字经》《百家姓》等蒙学读物。该阶段的华文传播形式是基于宗亲的私塾和义学, 其性质是家族亲形式私产。

随着移居东南亚的华人华侨数量日益增多, 以宗亲组织发展起来的纽带逐渐被更大的地缘性纽带取代, 宗亲组织被同乡会取代。同乡会建立在地域的基础上, 也称作会馆^{[4]108}。虽然会馆相比宗亲组织是一大进步, 但依然是封闭的地域性族群。各会馆使用自己地域的方言, 从而使自己与其他族群有别, 立足于会馆的华文教育自然而然也就成了不同方言教育的场所。该阶段封闭的地缘性族群使得华文的传播仅限于方言的传播。

(二) 认同中华母国的族群特征推动华文教育大规模发展 (20 世纪初至中期)

进入 20 世纪后, 伴随着辛亥革命、抗日战争和新中国成立这三大历史事件, 东南亚华人的民族主义思潮也分别出现了三次高潮。在祖国争取自由民主、抵御外敌入侵的关键时刻, 流寓在外的东南亚华人爆发出自觉自发的民族意识。他们认识到自己的命运和祖国息息相关, 将对家庭、宗族和家乡传统的狭隘认识转化到对“国”的认同上, 将自己的定位从“流寓的中国某地人”转变为“流寓的中国人”。东南亚华侨华人有钱出钱、有力出

力, 以各种方式支持祖国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在新中国成立之初, 许多东南亚有志青年回到祖国, 参与祖国的建设, 整个华人社会表现出以“复兴中华”为共同宗旨的显著特征。

东南亚华侨华人社会的另外一种支援方式就是“国语”的广泛使用和传播。由于身份认同的统一, “国语”的使用也广为东南亚华侨华人社会所接受。当时所谓的“国语”, 就是国内各个地区通用的语言, 由官方推动使用, 具有一定的政治导向, 推广的目的是方便交流沟通, 增进国民的国家认同感^[5]。因此, 在三次民族主义浪潮的推动下, 在华侨华人认同“中华母国”这一族群共性的背景下, 东南亚华文学校和华文教育迅速发展。

许多有识之士感到华侨内部需要协调团结, 改变华侨社会的一些不好的做法。他们将各地的中华会馆或中华总商会联合起来, 成立了不同的教育机构, 如华侨学务总会、教育总会和马来西亚的董教总等^[6]。这些机构负责各地区的华文教育, 此后, 华侨学校也发展起来。到 1929 年, 仅新加坡就共有华校 204 间, 而当时东南亚华文学校约占海外华文学校总数的 90% 以上^[3]。1955 年, 新加坡南洋大学建立, 这是华文教育发展史上里程碑式的事件。华人华侨族群坚定地认同中华母国, 这种统一性的族群特征对华文的传播和华校的建立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三) “去中国化”的族群特征致使华文教育陷入低谷 (冷战时期)

二战结束后, 东南亚各国相继独立, 新中国也宣告成立。这个阶段的华侨华人社会与中华母国的关系呈渐行渐远之势, “去中国化”是该阶段华侨华人社会的族群共性。其原因如下。

一是东南亚国家摆脱了西方殖民统治, 建立了新兴国家。东南亚本地民族主义与东南亚华人华侨民族主义几乎是同步兴起的^[7]。东南亚各国担心我国政府利用华人华侨的势力动摇新生政权, 对华侨华人实施了排挤打压的同化政策, 包括对华文教育的压制。一部分华人迫于生存压力, 不得不选择“融入归化”, 开始疏远母语。另一部分人由于外在的排斥力强化了他们的族群特征, 他们选择了在夹缝中寻求生机, 以保持母语传承中华文化, 华文教育艰难地生存着。20 世纪中后期, 东南亚华人都在“融入归化”和“去中国化”的过程中, 华文教育因此陷入低谷。

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我国不认同双重国籍, 东南亚国家对华侨入籍的要求也做了调整, 降低了入籍

门槛。于是,许多华侨转入居住国国籍。例如,在 1975-1986 年间,菲律宾约有 20 万华侨加入菲籍。到了 90 年代中期,菲律宾约 110 万的华侨华人中,仅有 1 万人保留了华侨身份^[8]。华人逐渐从“叶落归根”的想法转变为“落地生根”,开始视自己为居住国国民,也开始以主人翁的身份参与居住国的社会生活。东南亚华人的身份认同和心理归属也使得他们逐渐接受了自己的族群新特征——脱离了母国的“华人族群”。

三是冷战时期的意识形态影响。二战后,东西方形成了意识形态领域的两大阵营: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和以苏联为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在意识形态领域斗争激烈的冷战时期,东南亚各国的华文教育被认为是传播以中国文化为目的的社会主义思想教育,而各国华校则被认为是共产党或左派传播社会主义思想的大本营,因此,必须对华校实施强力打压。在这样的历史时代背景下,东南亚华人的“去中国化”已成定局,华文教育也自然落入低谷。

(四)“具有当地国特色的华人”族群特征推动华文教育再次转型(改革开放以来)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国际地位日渐提升,东南亚各国对华人施加的政治压力有所缓解,这些都成为华人族群特点的影响因素。根据李明欢等人的一项调查,现代的华人华侨后裔对自己的族群认识,有如下共同特点^[3]。

首先,东南亚华裔在政治上已经认同了所在国。调查发现华裔留学生常常会使用“我们菲律宾”“我们泰国”等措辞表达对所在国的认同,从这些日常表达中可见他们对自己身份的定位已变成“菲律宾华人”“泰国华人”或“马来西亚华人”等。

其次,东南亚华裔已接受了当地的文化。现在的东南亚华裔大多都是华人移民的第三代和第四代。他们接受了当地正规的学校教育,不再将自己视为异域华人。相对而言,他们对华文华语(尤其是普通话)却越来越陌生。笔者 2018 年 1 月曾赴泰国做田野调查,发现一个普遍现象,很多餐馆的经营者能用简短汉语与中国人沟通,但无法深入,稍做交流得知,这些人已经是华人的第三代第四代。而中国游客常常光顾的餐馆,往往是对华文华语传承较好的华人后裔在经营。华人利用自己得天独厚的语言优势,对泰国的旅游业所做的贡献,这对未来的华文推广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第三,东南亚华裔依然保留着对自己族群的强烈认同感。如果说对居住国的政治认同是从被动接受到自然

认可,那么东南亚华裔对自己作为华人的族群意识则是与生俱来的集体印记。他们虽然已经认同了自己属于当地国居民的事实,但在政治生活中,会坚决地站在华人的立场,力争与本地族群平等的地位和利益,维系华人族群的共同特质。这个阶段的华人后裔正处在中国与东南亚各国建立友好关系、共谋发展的历史时期,华人华侨对自己的族群认知和定位是出于自发自觉的理性意识,而非被动地迎合当地社会文化以寻求生存机会。

这样的宽松环境为新世纪成长起来的“华二代”“华三代”创造了多元化和国际化的成长氛围,他们能够在不同文化之间穿梭,也能够重新审视自己作为华人的特质。他们看到了中国与东南亚各国未来的合作前景,也清醒地看到了华文的重要性,开始重视和加强华文的学习,形成了华文的隔代传承之势。同时,中国改革开放以及新世纪中国崛起的势头也推动新一代中国人移民到东南亚,东南亚华人华侨社会也在发生着一些变化。在新一代移民中,15%的移民非常富有,40%从事贸易行业,技术人员和管理者占 30%,剩下的则是教师、记者和媒体发行人^[9]。新移民和老移民的融合与互动都会对华文教育产生积极的影响。

二、现阶段东南亚华人族群特征对华文教育的影响

(一)语言使用中的包容性助力华文传播

现阶段华人在政治上已经认同当地国家,在文化上,他们接受了当地学校的正规教育,对原住民社会生活已不陌生,更不排斥。那些在当地出生的“华二代”“华三代”,早已习惯了使用居住国的语言和文字,他们对华文、华语反而相对陌生。当然,不同国家的华人后代对华文的重视程度受到国家政策、家庭氛围以及个人意愿的多种因素影响。笔者 2018 年 1 月在泰国做田野调查时发现,同为福建人后裔,两个中餐馆老板的华文口语水平差别很大,访谈后得知,其父辈对华文的重视程度差异导致他们华文水平的巨大差异。李明欢的一项调查表明,访谈对象的 82% 与父母交流时使用印尼语,92% 与朋友交谈时也主要使用印尼语。菲律宾的大多数华人家庭依然会使用母国的闽南语,使用菲律宾当地的他家禄语作为家庭成员间交流用语的占比只有 20%^[3]。

(二)民族自豪感和使命感加快华文传播

中国改革开放尤其是进入 21 世纪以来,中国—东盟关系发展形势良好。2002 年正式启动的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2013 年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以及始于 2008 年的“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都已成为中国—东盟关系的助推剂。中国的强大以及与居住国关系日渐紧

密的势头,使东南亚华人再次树立起身为华人的民族自豪感,这成为新时期东南亚华人族群最鲜明的特色。华人看到了在国际舞台上华文越来越重要的地位,意识到自己传承中华文化的使命。笔者在走访泰国的民间培训机构时,接触到来自中国台湾的华人蔡女士,她在泰国曼谷经营的木兰汉语培训学校,虽几经波折却从未放弃,一直坚守在汉语教学的第一线。

在东南亚各国的历史进程中,华人华侨的“叶落归根”思想一直是让华文华语得以生存的主要原因。而现阶段,中国世界地位的提升给华文教育在海外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国际地位。华语再次成为华人身份的明显标识。刘宏将这种现象称为“再华化”^[10]。这种说法有它的合理性,同时证明了国家硬实力对东南亚华人华侨族群定位的重要影响,也反映了华语华文的未来发展前景。

(三) 身份的二元性影响着华文传播

东南亚华人意识到自己的华人族群根植于中华母国但又成长于居住国,他们身上既携带着中华民族的母国特质,也印下居住国的文化烙印,因此,既不能被动地当地化也不能单纯照搬中华文化。华人华侨要推动华文教育的发展,应根据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与族群特色,对自己的族群文化进行重新构建和优化。与此同时,还需顺应原住民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关系。华人华侨从中华母国可以传承的,是中华文化的内在规律及其内涵,而在传承过程中,需要考虑各国不同的教育政策、教育思想、办学理念以及国家间关系等要素。

东南亚各国华文教育再度出现热潮的情况下,既要借助国家间关系推进华文教育,同时也应该充分发挥华人华侨对华文教育不可估量的推动力。在发挥华人华侨对华文教育作用的过程中,应该充分考虑当地华人的族群意识和文化。华人华侨愿意携手努力,保持他们共同的族群特质,保留他们的族群联系,也愿意致力于维护族群平等地位和合法权益的活动。这样的族群意识和文化有利用华文华语优势、服务于居住国经济、搭建中国与居住国之间经济贸易等各个领域合作桥梁的利益需求。无论是哪种需求,对华文华语的推广都会起到积极正面的作用。要发挥华人华侨对中华文化传播的推动力,就要清醒地认识到文化的构建有内在的规律,需要长期有意识地倡导与努力,正如英语在中国乃至全球地位的确立,也非一朝一夕可以完成。

总而言之,现阶段东南亚华人族群在政治认同上继续融入归化,思想上从“叶落归根”转变为“落地生根”,在文化上日益开放多元。因此,在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关

系日渐紧密的形势下,有必要根据东南亚华人华侨族群特点,做好华文教育的战略规划。

三、借助华人华侨发展东南亚华文教育的策略

东南亚地区是世界上华人华侨最集中的地方^[11]。有学者言“单单人口总量就可以决定某种语言是维持、转移还是死亡”。从人口数量来看,东南亚华人在全球华人数量中占据了绝对优势。从族群特征而言,东南亚华人经过历次移民大潮,形成了稳定的族群聚居状态,这对东南亚各国的华文教育发展无疑是有利的。因此,借助华人华侨发展东南亚华文教育的策略方案,可以从以下方面入手^[12]。

(一) 中国侨办继续举办有政策性倾斜的文化交流活动

有关国务院侨务办公室的职能规定中明确指出,“国家侨务办负责指导、开展对华侨华人及其社团的联谊和服务工作……”以及“指导、推动涉侨宣传、文化交流和华文教育工作。”^②目前,国务院侨务办组织的文化活动有:“中国寻根之旅”系列活动、“华文教育·名师巡讲”活动及“海外华裔大学生夏令营”和海外华文教育基地等^③。“中国寻根之旅”系列活动自1999年开始举办,是侨务部门开展华文教育工作的品牌活动。“寻根之旅”主要是创造机会让海外华裔青少年回母国参观,用课堂学习、参观游览、联谊交流的各类活动,增加这些孩子对祖(籍)国的了解和认识,也增加感情^[13]。“海外华裔大学生夏令营”是我国侨务部门与国外高校搭建起的中外优秀大学生交流学习的平台,活动的目的是增进海外华裔大学生对中国社会的了解,加深海外华裔大学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特别是侨乡文化的认识,推动中外人文交流,促进民心相通。

东南亚华人族群在海外华人中占比最高,侨务部门在组织“中国寻根之旅”等传播中华文化的系列活动时,应该区分对象国和参观拜访的目的地,东南亚华人华侨多来自中国福建和广东,在组织东南亚华裔“中国寻根之旅”系列活动时,应多安排在福建和广东这两个省份,让这些“华二代”“华三代”亲身体验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近距离接触自己父辈成长的地域文化,感受祖籍国的发展变化。这既能增强他们作为炎黄子孙的骄傲,也有助于他们成长为中外沟通和传播文化的使者。

(二) 避免意识形态领域的语言文化

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东南亚华文教育几乎遭受灭顶之灾,是因为东南亚各国的华文教育被认为是传播以中国文化为目的的社会主义思想,而各国华校则被认为

是共产党或左派传播社会主义思想的大本营。因此,华校受到严厉打压。总体而言,当前东南亚华人华侨与祖籍国的实体关联已不复存在,维系他们与中华母国关系的是精神中的“文化中国”和华人身份。“一带一路”倡议以及“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构想,是为了寻求共同繁荣,实现世界和平而共建共生。促进华文华语传播,是通过语言相通而达到民心相通。

现阶段中国与东盟关系全面发展,在各个领域展开积极合作,但是,双方的合作不可能跨越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的差异,尤其要考虑华人族群在居住国的利益。建议从语言的工具性和实用性出发,借助华人华侨传播华文。华人华侨族群在推动华文教育的过程中,也应该充分考虑到居住国的国情和政治文化制度。

(三) 通过华裔群体构建华文传播的“星状”网络

东南亚地区华人华侨社团的重要组成部分即华裔群体。它是华侨华人在地理同根、血缘联系和语言纽带基础上构成的商业网络和联盟,也是东南亚华人族群在商业领域的带头人和代言人,是展示华人华侨经济实力、扩大影响力以及传播中华文化的重要窗口^[14]。任何领域的合作往来,都离不开语言开路。华裔通过其语言优势可以为经贸领域的合作提供便利,同时,也可以传播诸如“仁、义、礼、智、信”等中国传统文化,最大限度地创造多赢局面。

关于利用华裔群体传播华文的方法,可以借鉴吴应辉所提出的语言传播体系“星状”模型理论^{[15][256]}。“星状”体系是一种多点发展、遍地开花的模式。各个扩散点遍布世界各地,各点又分别辐射一定的区域,形成了相对稳定的网络系统。东南亚华人华侨约占全球华人华侨的73.5%,这是东南亚华文教育不可多得的宝贵资源^[1]。如果把全球的华人华侨比作散布的星星,占比最大的东南亚华人华侨就如同最亮的启明星,而东南亚华裔群体则是启明星中心的发光部位。唤醒这部分沉睡的资源,利用华裔的语言优势、经济实力、商业网络、人脉资源和出身背景,构建东南亚华文教育的商业—文化一体式“星状”传播体系,是完全可行的。华裔群体可以在各自的聚居地和聚居国出资办学、集资建校、引进或培训师资、编写本土化甚至区域化的教材,使华文在东南亚落地生根,逐渐形成可以辐射到全球其他各国华人华侨社会的稳固的“星状”传播体系。

(四) 发挥华侨华人在华文媒体传播中的重要作用

华文媒体是东南亚国家了解中国的一个重要窗口。在华人华侨数量集中的东南亚地区,华文媒体最为兴盛

的当属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在这两个国家,华文媒体已成为当地主流媒体的一部分。新加坡《联合早报》是东南亚华文大报之一,具有很大的影响力。新加坡、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都是华文媒体传播的前沿阵地。马来西亚的数十家华文日报的日销量超过马来文报和英文报,星期日销量已达100万份。随着电脑网络技术和新媒体的到来,东南亚的华文电子报刊也在迅速发展。1995年,《联合早报》电子版问世,这是东南亚首家华文报纸网络版,此后各式各样的新闻网站应运而生^[14]。

华文媒体已经成为东南亚华文传播的重要媒介,但当前依然缺乏专业的传媒人才。作为东南亚华文媒体的主要读者群,华人华侨要大力支持并推动华文媒体的发展。首先,有条件的华人华侨可以积极投身到传播学和媒体学的学习和研究中,多接触各种新媒体手段与传播学理论,努力让自己成长为华文媒体传媒领域的行家里手。其次,华人华侨在助力华文媒体传播的过程中,要多从中华母国的利益出发,多为中国代言,引导媒体的舆论。要利用华文媒体传播的主阵地,积极传递正面信息,支持中国政府行为,维护中国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宏伟蓝图中的正面形象。再次,华侨华人可以借助自身的身份特质,利用媒体的宣传和推动,在线上广为征集和宣传华人华侨社团的各类传统文化活动,推动线下华人华侨族群的联络,增强华人华侨族群的凝聚力和对中华母国的情感,吸引更多的华人华侨支持华文媒体的发展,从而开拓更多的渠道传播中国声音,为“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搭建文化桥梁。

注 释:

- ①《国务院关于华侨权益保护工作情况的报告(全文)》, <http://www.gqb.gov.cn/news/2018/0426/44797.shtml>。
- ②国务院侨务办网站:<http://www.gqb.gov.cn/zyzn/index.shtml>。
- ③国务院侨务办网站:<http://www.gqb.gov.cn/hwly/index.shtml>。

参考文献:

- [1] 庄国土. 东南亚华侨华人数量新估算[J]. 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9(3).
- [2] 庄国土. 论中国人移民东南亚的四次大潮[J]. 南洋问题研究, 2008(1).
- [3] 李明欢. 东南亚华人族群与华文教育[J]. 海外华文教育, 2008(3).
- [4] 曾少聪. 漂泊于根植——当代东南亚华人族群关系研究[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4.

阴阳爻溯源

李林贤

摘要:八卦是五行和四时的量化工具,阴阳爻是八卦的基本构成要素,作为量化工具,阴阳爻和八卦一样,它们的构建过程必然要在阴阳学说的理论框架之下来完成。文章以阴阳思维为依据,首先对以往阴阳爻的起源理论进行了辨正,然后提出了阴圭阳影的起源思路。阴静阳动是分辨阴阳的基础概念,同样也是突破“阴影”常识、进行以影画阳的判定标准。另外,通过大地湾遗址符纹图饰与西安地区二分二至日的表影游移区域图的符合性比对,证明了大地湾以及仰韶文化是阴圭阳影理论成立的历史和文化基础。

关键词: 阴阳爻;圭表;日影;大地湾遗址;仰韶文化

中图分类号: B2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CN61-1487-(2019)01-0022-05

DOI:10.16721/j.cnki.cn61-1487/c.2019.01.005

八卦是由阴爻“— —”和阳爻“—”两个基本爻象组成的,对这两个爻象的起源,学界有着诸多不同的解释,有龟兆说,认为阴阳爻就是模仿龟甲兆纹的变化而来;有筮草说,有节无节是其区分阴阳的要点;有结绳记事说,用大小结来表述阴阳爻的不同;有生殖器说,认为阴阳爻就是男女生殖器的象形。这诸多认识能共鸣并存,直到当下仍悬而不决的根源在于,这些解释都没有将阴阳爻的诞生置于阴阳学说理论的构建过程之中。

任何定义的形成,首先要有预置条件的存在或者其诉求与目的的指向,对阴阳爻而言,作为八卦构成的基本要素,它是为量化或者分类而诞生的,同时也要为事物阴阳形态的解读,提供一个最基础也是最清晰的辨识标准,所以阴阳爻作为阴阳学说的基本元素,其本身也应当遵循阴阳模型的理论架构。在阴阳模型中,五行和四时是两个相互对待各为体用的单元。五行作为阴,是对空间进行分类定义;四时作为阳,是对时间进行次序分解。^[1]

那么阴阳爻也是同样,它们也应当参与空间和时间两种属性的定义。

作为阴阳学说的量化方法,阴阳爻或者说八卦的诞生必然要晚于阴阳学说基本架构的形成。所以阴阳爻的构建原理一定要服从于阴阳学说的理论架构,它们具备阴阳思维的特质就成为一个基本要求。

所以,阴阳爻的诞生环境以及不同属性的边界是非常清晰的,要还原阴阳爻最初的构建原理,以这些清晰的概念界定为基点,对已有起源理论进行分辨,就成为一个首要环节。

一、阴阳爻起源理论的辨正

在龟卜的过程中,骨甲的兆纹,从大的分类来看,确实会呈现出与阴阳爻相似的或断或连的形态。但是从实证的角度来看,以这种或断或连的兆纹来模拟阴阳爻,在目前出土的甲骨中,还没有找到兆纹与卦之间可操作的准确关联的物证。其次,卜卦的形成是以三根或者六根

- [5] 韩晓明. 东南亚华人身份认同变化对汉语传播的影响及前瞻[J]. 语言文字应用, 2016(4).
- [6] 宋兴川, 陈欣. 从东南亚华族群的变迁看华文教育的发展[J]. 八桂侨刊, 2011(3).
- [7] 曹云华. 东南亚华文教育的过去、现在与未来: 国家间关系的视角[J]. 东南亚研究, 2015(1).
- [8] 庄国土. 东南亚华人参政的特点和前景[J]. 当代亚太, 2003(9).
- [9] 代帆. 东南亚的中国新移民及其影响[J]. 东南亚研究, 2011(2).
- [10] 刘宏. 中国崛起时代的东南亚华侨华人社会: 变迁与挑战[J]. 东南亚研究, 2012(6).
- [11] 张振江. 试论早期香港华人群语言的竞争与选择[J].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8(2).

- [12] 裘援平. 华侨华人与中国梦[J]. 求是, 2014(6).
- [13] 国务院侨务办公室. “寻根之旅”增强华裔新生代身份认同[EB/OL]. 2018-5-24. <http://www.gqb.gov.cn/news/2018/0524/44913.shtml>.
- [14] 方长平, 侯捷. 华侨华人与中国在东南亚的软实力建设[J]. 东南亚研究, 2017(2).
- [15] 吴应辉. 汉语国际传播研究理论与方法[M].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13.

作者简介: 鲁芳, 副教授, 西安思源学院东南亚研究中心研究员, 研究方向为国际关系及东南亚国情。

(责任编辑: 朱希良)